

余也鲁 郑学檬 主编

座谈会论文集

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

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

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

余也鲁 郑学檬 主编

[闽]新登字 09 号

从 零 开 始
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
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
余也鲁 郑学檬 主编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沙 县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 850×1168 1/32 9.25 印张 2 插页 230 千字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5615-0966-9/Z·24

定价:7.00 元

目 录

论探索(代序)	余也鲁(1)
简略检视台湾学界传播研究中国化的努力	徐佳士(10)
中国传统的传播观念初探	郑学檬(16)
谚语格言与传的原理	孙旭培(25)
略说中国传说中有关言语或传的计策行为	乔 健(38)
论中国朝野之间的传通	朱增朴(44)
从“礼治”到“法治”:传的观念.....	吴予敏(50)
辛亥时期的革命宣传:台湾地区学者研究	
成果之检讨	张玉法(60)
从“传”探索古代中国传播的类别与特征	黄金贵(69)
借物传声与以声传意	
——中国传统文化中声的传通探索	高国藩(97)
中国古代的商业和传播.....	叶世昌(111)
从孟城驿遗存看古代邮驿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张学洪(122)
浅论先秦百家争鸣与文化大传播.....	陈亚兰(130)
试论中国人际传播的若干特征.....	倪 迅(146)
论西北文化传播的特征与机制.....	戴元光(160)
我国春秋时期的说卦与讯息传播.....	李国正(180)

谈中国古代五行灾异符应说物象传媒	
体系的建构·····	郭 锋(194)
中国古代艺术批评与符号传播的伦理化	
倾向初探·····	周 旻(217)
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中外文化交流	
——从跨文化传播的原理看佛教在	
中国的传播·····	吴 伟(234)
物我两浑 情景交融	
——中国古诗词中的内省传播研究·····	陈安全(258)
现代公共关系在中国发展的深层文化心理基础·····	纪华强(266)
广告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	陈培爱(280)
从零开始	
——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中传的探索	
座谈会总结·····	余也鲁(288)
后记·····	(292)

论 探 索

——回到历史,回到中国

余也鲁

新时代的不确定感

我们已生活在“信息时代”中,一个用通讯卫星、电子计算机、传真和多频道电话、波导等组成的高科技信息网,已将本来很大的地球,变成了一个声息可闻的小村落。

人在这个争剧变迁的社会中越来越孤单,本来财富分配上不平衡的社会,现在又在知识资源的分配上走向两极化。

这个时代的特色是:

1. 信息的储存量和回输速度惊人地增加。一个大小跟指甲一般的矽基块(chips),可以储存 400 万个比特单位的信息。过去一万年已记录下的一切信息,都可以储存在一个两公尺立方(8 立方尺)的盒中。

2. 人与人通过机器通讯,中间的时地距离都已消失。你可以在几分之一秒内用电话或传真,与另一个半球上的人说话或通讯,比和邻居说话还方便。

3. 信息出现过多的情况,需要专人来整理和分类,更需要专家来分析。不少本已放弃的人际传通手段,例如新闻信,已恢复使用;

而资料搜集、专家咨询服务、顾问公司等,现在成了新兴行业。

4. 劳动力开始继工业革命之后又一次大转移。信息成为新社会的基本“工业”,和决定一个国家或社会强弱的资源(全美有一半的劳动力从事的工作都可以纳入信息服务中)。这是 20 年前难以想象的。

就像土地是农业革命的推动主力、能源和机器是工业革命的推动力一样,信息成了这个新时代的主动力量。

社会科学家从过去半个世纪中人的传通关系里,找出了一些传的模式,找出了一些左右社会发展的因素,以及传的过程中传者和受众的性质。他们发现了某些成因可以导致某些“寂静”和“不寂静”的效果。他们尝试用已建立的一些大、小理论,来解释新时代中出现的新问题,并企图作出预测。

他们这种想从变化万端、速度惊人的社会变迁中找寻一些传的规律的努力,似乎成就不大。他们成功地提出问题,但很少能提出满意答案。

传学奠基人之一的宣伟伯博士(Dr. Wilbur Schramm)在检讨过有如“科幻小说”的信息世界之后,只能说:

未来的年月会相当令人兴奋,是最有希望和潜力的岁月,可也是最威胁人类的日子;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站在工业革命始点的那些男女,对命运一定也有过同样的不确定感;但希望我们对未来能比他们更多点把握。

中国长春的文化可有的贡献

这位眼光独到的一代学人,在 1982 年来香港任教二年中,十分寄望于中国学人能在这方面作出贡献。他说:

我们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学习科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人，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悠久的传的艺术，总免不了会肃然起敬。我们常想，中国人那种深邃的智慧和洞达，要是有一天能用来帮助西方人多了解自己的工艺知识，增加我们在实验方面的体会，应是十分令人鼓舞的事。

他又说：

许多人已注意到现代中国人在传的学问上认识的深刻和精到，不但反映了悠久的历史传统，且常能推陈出新。

真的，中国人数千年有记录的历史中，和在比没有记录的历史更长远的悠久传统中，恐怕已经历了一切人的传通经验与尝试。时代与科技尽管演变，但人的传通的基本性质不一定会变。

从中国历史中去探索传的理论与实际，也许可以比诸考古学家从岩石的碎块和露出地面的断层所记录的地壳变动的信息，来建立现在地面山脉河谷、绿野荒野形成的理论，并且据以预告未来地层的变动和地震等现象。

我相信，研究中国的历史（包括文史哲）与传统，对深潜在中国文化中的传的艺术作系统与科学的发掘和整合，作出大胆的假设，一定可以探究出一些传的理论的架构并找出道路，来开辟一个传学研究的新天地。

怎样从历史中去探索

人类的历史应该怎样去研究，我们的前人已经确立了许多规范和方法。一块恐龙头骨的化石，经过人类学家的观察，能把埋藏在地里已一亿年的古老信息带给现代人（最新的研究，是说恐龙乃鸟类的祖先，行动灵活，极好群居，只是样子奇丑）。

先民用石头钻木取火。只要燃起一堆火，再凶狠的野兽也会远

远走避。我们有了火,有了将质量变成能量的本领,人和其他动物开始产生分野。

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为工具和生产技术改变生活的惊人能力所震慑,是毫不为奇的。轮子的发明革新了运输,马匹和火药的使用,革新了战争。我们用工具的出现来划分历史研究的时期,分为石器、铜器、铁器等等时代,也是未可厚非的。

但我们也可以把信息(有人说,信息是高度浓缩了的能)当作重心,来研究人怎样储存、传输和取用信息的历史;研究人的这种传的行为,在人类求生存的悠久奋斗过程中,怎样作用,怎样形成今天这个充满希望但也隐伏危机的文化,也许同样能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和社会,提供解决问题的契机。

这当然不是说,其他的历史研究方法不重要;不同的观察角度与说明方法,同样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的文明,了解自己和世界。

但我们希望尝试一条过去尚少人去探索的新道路。我们是带着战兢的心情来从事的。

研究人类储存与传输信息的能力、过程和变化;研究人类传输信息的系统和这些系统的建立、扩展及和其他社会系统的交互影响,是我们以信息作重点来研究历史的两条可行途径。

换句话说,从历史和传统中,我们可以探索人的传通的过程与作用,也可以探索传通的结构与制度。

人类传播的历史象人的出现一样悠久:

二万年前,上古的艺术家,已能用原始的黄、棕、金的泥土彩料,把当日的所见画在我国许多著名的洞窟中(最新发现的一个在内蒙古),这些岩画,象法国、西班牙和非洲洞窟中的岩画一样,一定可以供我们探索史前时期人类的传的活动,找出他们怎样通过岩画来团结一个社会,来教育下一代。

人类一开始就懂得用感官、中枢神经和肌肉来表情、会意,来

进行双向传通。他们用简单的声音和手势来传递信息。等到语言发明,人可以不受环境和身体的制限,把信息传开,而且可以从实体进到抽象,从糖的“甜”进到抽象思维中的“甜美”。语言的发明当然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

有了火,有了工具,有了艺术,加上语言,人类已可过结社的生活,进行简单的分工;又可以从一地迁到另一地,去建立更适合生存的家园。群体间有了交换经验的语言,可以共享知识,分享劳动所得。人进入了史前的“黄金时代”。

但这只是人类史的序曲。卡尔·塞根博士(Carl Sagan)将宇宙从“一声巨响”开始到今天的150亿年,比作一个只有365天的“宇宙年”。假若太阳系的出现定在50亿年前,应该是这个宇宙年历的9月4日,恐龙的出现(二亿年前)为12月24日,人的出现则是12月31日的事。这位塞根先生的名句是“宇宙很古老,人却很年轻”。

有人仿“宇宙年历”将人类出现的地球上的历史比作只有24小时的一天。这一天的一个小时等于41667年,一分钟等于694或700年,一秒等于12年。假若将语言的出现定在10万年前,那么,影响今天社会的传播大事都发生在这一天最后的两个半小时。而我们要研究的有记录的历史,只是最后的十分钟。

人带进到有记录的历史中的,除了爱、恨、恐惧和欢乐之外,最重要的是把传承的心智和感情的经验,本来储存在他们的记忆中,因着文字的发明,记录了下来。有了文字,人类有了比大脑更耐久的储存信息的工具。我们有了这种新的“记忆装置”,开始制作书籍,建造图书馆,创设学校,发展科学,建起了城市。我们的文明从黄土地扩向平原和沿海。

以信息作重点来探索人类史的发展,从洞窟岩画进到今天的砌基块,的确是能令人陶醉且收效大的一个研究方向。

传的本领与生俱来

传其实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孟夫子说“食色性也”的时候，忘记了把更重要的“传”也列进去。要人保守秘密的不容易，和将人监禁当作刑罚，都和禁制传的本能有关系。古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格言中劝人少说话的特别多，都是传这种行为具有无比威力的好说明。

传与生俱来。我们用啼声开始一生，以停止说话、传意终止生命，其间几十年，几乎全用在传的活动上；即令在沉默时，脑中有自我对话；在睡眠中，梦境里传的热闹，也不亚于清醒时。

传的活动像空气，无所不在。也像空气，太普遍反未能意识地觉得它重要，因而一直没有把传当作人生一大需要来作有系统的研究。

但从中国的古籍中，只要稍微留意，便可以发现，我们是一个很考究“传”的民族：

中国人不只重衣着，而且看重衣着的无声传的作用。随便举一个例子。《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衣着之衿一般向右，夷狄之人则向左。衣着不仅蔽体保暖，还有认同文化的作用。中国人不只注重食的艺术，也看重食物的无声的传。随便引一例来说明。商代，周武伐商，伯夷、叔齐劝他不可轻举妄动，但周武未听，灭商。二人以食周粟为耻，宁可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以至饿死。可见吃东西或不吃一样东西，都赋予了道德的意义，传递一种情操。

中国人对居屋在无声的传的方面的作用，重视不下于衣着和饮食。建筑物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文化的语言。《礼·曲礼》：“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建筑的先后传递一

种价值观；而《易·系辞》：“上古穴居而野处”，早已把居住的情况来说明、来衡量文明的程度。

中国人对“体语”(body language or Kinesics)运用的本领，以及对非语言传通的重视，早已够写一本很厚的书。

中国人不只注意无声的传，也十分注重有形的与有声的传的行为。

《论语》在过去是大家必须读的书。《论语》开头第一句便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圈破读，意为“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上半指的是知识的学习，是人的基本的传的行为；下半讲的是活的知识的取得，是人际传通的活动。

就在《论语》同一篇中(学而篇)，提出三省之说：“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就不只要求人人应对自己的传的行为加以检讨，还为这三大基本的传的活动定下了一个检讨的标准。为人谋是思想的实践，要忠；与朋友交是人际的来往，要信；传指从讲授得来的知识，属于人类知识与经验的传递，要有恒地温习。

中国人在衣、食、住、行之外曾倡导“育”与“乐”，育中包括教育，乐中包括娱乐，二者都是“传”的一部分。可惜，从来没有进行过科学性的探索。^①

用历史上集中运用“传”的事例作入口

西方开始把“传”的行为当作一个重要的题目来研究，也是近

^① 我在《传媒·信息与人》这本译述中，曾有一篇“代序”，题为“中国文化与传统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探索的看法，可供参考。本段引自此文。

半个世纪的事,而且是因为第一次大战的宣传的需要,添上无线电广播引发的社会上的激荡,才有一些社会科学家着手来搜集资料,进行研究,逐渐建立起我称之为“传学”而一般叫做“传播学”的学科。

医学上的新药,像盘尼西林的发现;物理学上的新理论,像通讯卫星的概念,现代电计算机的原理,以及电晶体的发现,都在40年代二次大战期中和紧接以后的几年,因着战事加剧,夺取胜利的需要,国家才集中人材物力来寻求突破。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点探索传的行为的研究入口的方法。一个社会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为了解危机,为了寻求政治或经济上新秩序的建立,或新领域的开拓,为了更有效地提高人口的素质,常会把传的本领和积累的传的经验,扩大和加强,集中起来运用。就好像一个家庭发生大事,传的活动会突然加剧起来一样。

这些已记录在我们历史中的大量集中使用“传”的经验,是今天研究传学的宝贵财产。

我们不难从这些成功或失败的例子中,找寻出一些规律,归纳成原则;然后把这些原则当作假设,在现社会的生活中求证,从而逐渐建立起一些理论。

1978年,在香港和台北,曾举行过两次各为期一周的“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实际的研讨”,找到了12个探索的入口,它们是:(1)传与创新;(2)政治传通的结构与途径;(3)传与革命;(4)人际传播的特征;(5)说服的理论与实际;(6)环境(SETTING)与传通;(7)符号与传;(8)民间传通途径;(9)传播工具及其影响;(10)中外文化接触中“传”的活动;(11)从语言的浓缩与过滤中找“传”的原理;(12)基本的传的观念的研究。

入口当然不止这些,但这里已提供了一些供我们思考的材料。

入口当然也不只限于历史,当代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可以供我们研究。但如果说,研究传播建立理论,一定要靠新的文献,要从新近的经验中去汲取素材,不必靠我们祖先已积累的经验,就能闯出一条路来,则是不切实际的。

罗马作家西塞罗说:“一个人若不知道他出生前已发生的事,他将永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英国史家阿克顿(John Acton)也说:“历史须把我们从这个时代的过分影响中,从周围环境的压力下解放出来。”

研究人的传播,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时间的地方主义里。

我想,我们的祖先在黄土地上,从结绳记事,烽烟传信,胶泥活字印刷;从战车纵横之术,历代变法维新,一直到今天所发展出来的许许多多的观念,尝试过的传输与使用信息的方法,和从这些震撼的经验中得出的许多规律,一定可以大大拓展我们的眼界;在这个信息的大时代中,帮助我们比过去的世代更多点把握,建立一个和平与和谐的现代世界。

附注:

我个人对历史所知有限,对古籍涉猎不多;对社会科学也偏于传播一隅,本无资格对这个新的尝试说话。但我深信研究中国的传播理论从历史着手是一个十分有用的途径,因为历史家的一个责任,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记录的正是“关系”与“演变”,刚好是传学研究所关注的题旨。

由于凡事总应该有个开始,我因此不揣冒昧,在今天这个群贤毕集的座谈会上,勉强来试一下,希望能摸索出一条路来,让中国文化里头潜藏的一面,可以在大家的努力耕耘下,得到发扬。

1993年4月

简略检视台湾学界 传播研究中国化的努力

徐佳士

一、前言

台湾的传播研究是自西方，特别是美国，输入的一个学术部门。与其他社会科学相较，传播研究在台湾，跟世界其他地区相同，也是相当幼嫩的一个学术领域。学者们在努力消化西方理念之余，没有剩下多少精力去探究他们自己文化中关于传播的理念和智慧的库藏。

把目光转向自己文化传统，把传播作为制度或行为的理论性探研主题，还是最近十几年来的事，不过中国传播史的研究则是在较早的时期就已有人从事，而且颇有成果。

扫视这些年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他们努力的范围大致可分为下列七类：传播观念、传播一般理论、人际传播、非语文传播、口语传播、政治传播和传播伦理。如果将“传播研究”作广义的解释，则传播史也应列入。

二、研究课题

如果历史的研究亦被视为属于传播研究领域,到目前为止,台湾学者所触及的中国传播研究大致有八大类别,兹分述于后:

(一) 传播史 这是一个在西方传统中的传播理念引入之前,就已相当活跃的研究领域。除大学新开学系中国新闻史科目的教科书外,史的著述颇为蓬勃。重要作者有朱传誉和研究清末报业很有成就的赖光临等位。朱氏重要著作有《宋代新闻史》(商务,1967)、《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中正,1974),赖光临的主要著作有:《中国新闻传播史》(三民,1978)、《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商务,1980)和《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1981)等。

吴东权的《中国传播媒介发源史》(中视文化,1988)与其他大部分史书不同,他所说的“媒介”不是 media,而是指传播科技、工具、文字和其他的资讯载具等器物。传播史也一度是政大新闻研究所硕士班论文写作的主题。例如:洪桂己的《台湾报业史研究》(1968),阎沁恒的《汉代民意的形成与其政治之影响》(1971),张玉法的《先秦时代的传播活动及其对文化与政治的影响》(1975),石丽东的《万国公报的西化运动》(1981)等。

《报学》半年刊早期曾是新闻史研究者发表作品的主要园地,所刊出的重要论文收印在该刊丛书第六种《中国新闻史》(学生书店,1979)中,内有抗战时期史料多篇。

(二) 传播观念 擅长通俗写作的学者作了一些努力把中国文史中的传播观念推介出来。关绍箕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最多,例如《沟通 100: 中国古代传播故事》(远流,1989)、《中国谚语中的慎言思想》(台湾新生报,1992 年 2 月 11 日)、《〈西游记〉反映的传播问题》(台湾新生报,1992 年 9 月 19 至 21 日)和《贾宝玉与林黛玉的

人际传播问题》(台湾新生报,1991年12月24、27、29日)都是出自关绍箕的手笔。前述张玉法硕士论文中也简略涉及一些传播观念。这儿应提的另外一文是庄金城的《荀子教育思想中的传播概念》(辅大硕士论文,1991)。

(三) 一般传播理论 在台湾仍旧没有人用比较有系统的方法来就中国古籍中所可能蕴藏的传播理论作一次统合整理和阐释。但在特定主题同步发掘中国文化中传播理念的作品,有时也会简略涉及一般性的传播理论,例如方鹏程的《先秦合纵连横说服传播研究》(政大硕士论文,1973),魏荫驹的《探索荀子学说中的传播理论》(政大硕士论文,1980),关绍箕的《先秦非语文记号思想之研究:一个思想史与理论建构的综合分析》(政大博士论文,1987),胡元孝的《孟子口头传播的特质及其影响》(政战学校硕士论文,1985)和祝基滢、王石番、关绍箕的《先秦传播思想之整理分析——非语文记号思想之研究》(国科会专题研究,1985),以及关绍箕的《刘子传播思想初探》(报学,1991年2月)等。

(四) 人际传播 关于中国人的人际传播,徐佳士作了一次非常简略的“初探”。这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与国立政治大学于1978年在台北合办的“中国传播学第二次座谈会”上的报告,迄今仍未刊印发表。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胡幼伟的《分析〈论语〉中的人际传播概念》(政大硕士论文,1987)。下面一段检讨的非语文传播研究类别中的作品大部分也简略或零星地涉及与它们有关的人际传播问题。

(五) 非语文传播 这方面的重要作品有前述关绍箕的博士论文《先秦非语文记号思想的研究》,全文35万言。他以思想史方法探讨了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兵八家及其他人物的非语文记号思想,并试图建立一个理论,是一件比较有系统的中国传播理论的学术作品。这一领域另一作品前述祝、王、关三人的先秦非语文记号研究,主要内容没有超越关绍箕个人的论文。